

中宣部号召各级党政机关和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
发扬熊元启“自信、自强、自尊”精神
不断开创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
要提高政工队伍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以适应改革和两个文明建设需要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中共中央宣传部4月28日发出关于向优秀政工干部熊元启学习的通知，号召各级党政机关和工、农、财、贸、教育等各条战线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都要以熊元启为榜样，发扬“自信、自强、自尊”的精神，不断开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通知指出，“自信、自强、自尊”体现了八十年代广大政工干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发有为、无私奉献的可爱的时代精神。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自信，就是要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共产主义，坚信自己所从事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人类社会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必不可少的高尚而光荣的事业，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动摇自己的信念。自强，就是要根据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方针，结合改革和建设，以顽强的意志和开拓精神，精益求精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要具有象火炬那样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饱满的政治热情、勤于学习，勇于探索，自强不息，诲人不倦。自尊，就是要严格按照党的原则

办事，作风正派，一心为公，言行一致，为人表率；凡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决不去做；不以权谋私，不假公济私，要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模范作用，赢得人们的尊敬和信赖，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认真研究和探索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做好本职工作，更好地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为推进改革，实现“七五”计划，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不断开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我们时代需要千万个熊元启

本报评论员

新的历史时期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优秀政工干部熊元启同志，就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思想战线涌现出来的模范人物之一。他身上体现出来的“自信、自强、自尊”的精神，值得所有政工干部认真学习。

思想政治工作要开创新局面，就要紧密围绕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任务，适应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使他们能够充分地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首创精神。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努力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同时也要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袭，克服那些阻碍改革的错误思想。改革和开放给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任务更艰巨了。有些同志因此产生了思想政治工作不好做、不会做、不愿做的想法，忽视或者放松了这项工作。熊元启同志也感到工作的难度大了，要求高了，但是他从来没有动摇过搞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信心。新的环境、新的情况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他把党的需要、群众的需要当作自己神圣的使命，义无反顾，迎难而上，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出自己全部的光和热。

思想政治工作是人们塑造灵魂的科学的。从事这门科学的人，仅仅只有热情是不够的。我们常常看到这种情况，有些同志也“热心”做思想政治工作，但他们只会空洞说教，或者动辄板起面孔训人，其结果，被批评者听而不闻，受教育者敬而远之。为什么熊元启同志的思想政治工作充满活力、富有吸引力？一个重要原因是，熊元启同志没有停留在一般化做工作的水平上，而是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他在继承过去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努力探索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在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注意学习和吸收哲学、政治经济学、心理学、法学、管理学等知识，因而他的思想政治工作入情入理，卓有成效。

党和人民需要熊元启同志这样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不仅因为他是党的方针、政策的积极宣传者，而且因为他是以身作则、为人表率的好干部。古人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政工干部是教育人的，首先要做到自尊、自爱、做到自重重于言教。只要政工干部脑子里想的、口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都是同一个样子，都是真善美的统一，就能赢得人们的尊重和信赖，就能感召和鼓舞千万人一道前进。

党和人民期待着千万个熊元启。一大批熊元启式的人物成长起来，我们就可以建立起一支有战斗力、有说服力、有吸引力的思想工作的大军，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就会有声有色，就会促进两个文明建设不断开创新的局面。

1985年7月30日，石油部江汉石油管理局仪表厂宣传科长熊元启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年仅四十一岁。

仪表厂沉浸在悲痛之中。追悼会原计划只邀请一百名左右的职工参加，但冒暑三十八摄氏度炎热前来吊唁的却有四百多人。追悼会上，人们在低回的哀乐中潸然泪下。追悼会后，上百名职工又自动加入送葬的行列。一位因出差未能见到熊元启最后一面的老工人，回顾后悲恸地呼喊：“熊科长啊，原谅我吧，我来得晚了！”

这位曾痛过工友的逝世，为什么如此牵动人心？一位青年工人为了熊元启写的两句话可以作为回答：“英雄孤独离场出，闪光尽在细微中。”

改革也需要另一种工程师

1979年底，江汉油田钢管厂喜庆投产之日，也是上级决定这个厂停工转产之时。一时厂里工资发不出，人们的脸变成苦脸。有人编出顺口溜：“关停产，没活干，人心散。”机关干什么？有人提出要说“自救路”，“宣传科有照相机，干脆摆摊照相吧！”

经济调整是国民经济从比例失调走向良性循环过程中的必要阵痛。在这转折关口，熊元启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对科里的同志说：“革命战争年代，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了革命队伍在艰苦奋战而不溃散。企业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宣传科的同志齐心协力地投入到了转产的宣传中。

除夕之夜，家家都在吃团圆饭，熊元启却在凛冽的寒风中蹬着自行车，找到了八里外的政治处副主任任登美家里。任登美看到他气喘吁吁，以为出了什么事。熊元启说：“开展经济调整形势教育，需要写个材料，我想这个空跟你商量一下。”“不行！叫花子也有三天年嘛！”但熊元启坐着就是不走。这一夜，他们商量了很久。临别，任登美嘱咐：“过完年再赶材料。”可是第二天上班，一份万字讲稿送到了任登美面前。

形势教育有力地配合了工厂的转产，不久厂里生产出了畅销国内市场的新钢管。钢管厂的同志回忆往事，至今难忘熊元启拿着讲稿，扛着话筒在各车间奔走、鼓劲的形象。

1983年10月，熊元启调到仪表厂担任宣传科长。当时，全党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思想工作战线上批判了“大、空”的“左”的影响，社会上流传着“技术干部硬梆梆，政治干部不吃香”一类的说法，出现了轻视、贬低政工干部的现象。在这种气氛中，仪表厂有“四名政工干部改行，连‘老职工’、宣传科的一名副科长也说‘宁可去守大矿’都不愿再干下去。厂党委的一位秘书科长很伤心：‘我们趁早改行吧！’熊元启的心情很不平静。他一天几晚登门找副科长谈心，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于讲稿送到任登美面前。

熊元启说：“我们政工干部不能被轻视政工的风潮迷了眼睛！”对那位想改行的

销国内市场的新钢管。钢管厂的同志回忆往事，至今难忘熊元启拿着讲稿，扛着话筒在各车间奔走、鼓劲的形象。

熊元启说：“我们政工干部不能被轻视政工的风潮迷了眼睛！”对那位想改行的

羽坛年轻人顽强奋战力克上届冠军印尼队

中国男队夺回汤姆斯杯

本报讯 据北京电视台报道：5月4日晚，在雅加达举行的汤姆斯杯羽毛球团体决赛中，中国男队经过四小时四十五分钟的艰苦顽强奋战，以三比二打败上届冠军印度尼西亚队，夺回汤姆斯杯。这样，中国女队在代表世界羽毛球团体最高水平的汤姆斯杯和尤伯杯赛中，第一次双双夺冠。



中国男子羽毛球球队：(前排左起)黄益冲(教练)、侯加昌(教练)、韩健、李永波、周金灿、丁其庆、杨人燧(教练)、(后排左起)杨阳、什汉羽(教练)、张强、熊国宝、田秉毅。

中国男队这场比赛取得胜利的关键，一是新秀熊国宝在单打比赛中战胜印尼老将林水镜，再是双打选手李永波和田秉毅拿到宝贵的一分。

汤姆斯杯之争，第一盘，杨阳直落两局（十五比七、十五比一）战胜印尼队的苏吉亚托。紧接着刘邦高经过三局苦战，以二比一胜丁其庆，为印尼队扳回一分。第三盘单打，熊国宝拉短吊，伺机扣杀，终于磨垮林水镜，以两个十五比十三取胜。第四盘双打，印尼队纪明发、陈财富以二比〇胜中国队张强、周金灿。第五盘双打，中国队李永波、田秉毅以二比〇胜林水镜、陈金德。

获得汤姆斯杯赛第三、四名的是马来西亚队和丹麦队。



中国女子羽毛球球队：(前排左起)吴健、阮正芳(教练)、陈福寿(教练)、吴迪、吴显鹏、(后排左起)李玲蔚、韩爱平、林瑛、劳玉晶、关渭博。

赵东宛在全国劳动人事厅局长会议上指出

加强劳动人事部门精神文明建设
严格组织纪律树立良好工作作风

本报讯 劳动人事部部长赵东宛在最近召开的全国劳动人事厅局长会议上指出，各级劳动人事部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有一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干部队伍。

赵东宛说，劳动人事部门的绝大多数干部能够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但是，少数人利用职权拉关系、谋私利，对违反劳动人事政策的事情不抵制，甚至索贿受贿等问题时有发生。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坚决予以纠正。

赵东宛强调，劳动人事工作的对象是人，权力不小，影响很大。如果缺乏正确的思想方法、严格的组织纪律和良好的工作作风，不仅党的方针政策难以贯彻落实，而且还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损害党和政府的工作。因此，对劳动人事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和工作作风的要求应该更高、更严格。

赵东宛说，劳动人事工作的对象是人，权力不小，影响很大。如果缺乏正确的思想方法、严格的组织纪律和良好的工作作风，不仅党的方针政策难以贯彻落实，而且还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损害党和政府的工作。因此，对劳动人事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和工作作风的要求应该更高、更严格。

赵东宛还特别强调劳动人事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厅局的领导干部要起表率作用。

赵东宛还特别强调劳动人事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厅局的领导干部要起表率作用。

“风筝王”献艺

4月2日上午，在第三届潍坊国际风筝会暨第一届全国风筝邀请赛放飞场上空，千百只风筝竞翔，成千上万的观众在翘首观赏。突然，一只巨型“龙头蜈蚣”风筝腾空而起，飞向蓝天，赢得满堂喝彩。

至今已七十多年了。他扎制的风筝，精致优美，放飞高稳。1978年，曾在北京天安门前作放飞表演，荣获优秀创作设计奖。今年风筝盛会前夕，杨同科老人想，中国是风筝的故乡，又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一定要扎出既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特征、又有鲜明时代气息的风筝参加竞赛，为国争光。在区政府、村委会的支持下，春节过后，杨同科老人即带领全家日夜赶制，终于在风筝会前制成了。



自信 自强 自尊

——记模范思想政治工作者熊元启



熊元启同志的去世，为什么如此牵动人心？一位青年工人为了熊元启写的两句话可以作为回答：“英雄孤独离场出，闪光尽在细微中。”

秘书，熊元启热情洋溢地说：“我看生产建设需要工程师，改革也需要另一种工程师。政治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让我们都做这种工程师吧！”

熊元启说，熊元启热情洋溢地说：“我看生产建设需要工程师，改革也需要另一种工程师。政治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让我们都做这种工程师吧！”

熊元启说，熊元启热情洋溢地说：“我看生产建设需要工程师，改革也需要另一种工程师。政治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让我们都做这种工程师吧！”

熊元启说，熊元启热情洋溢地说：“我看生产建设需要工程师，改革也需要另一种工程师。政治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让我们都做这种工程师吧！”

熊元启说，熊元启热情洋溢地说：“我看生产建设需要工程师，改革也需要另一种工程师。政治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让我们都做这种工程师吧！”

熊元启说，熊元启热情洋溢地说：“我看生产建设需要工程师，改革也需要另一种工程师。政治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让我们都做这种工程师吧！”

熊元启说，熊元启热情洋溢地说：“我看生产建设需要工程师，改革也需要另一种工程师。政治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让我们都做这种工程师吧！”

熊元启说，熊元启热情洋溢地说：“我看生产建设需要工程师，改革也需要另一种工程师。政治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让我们都做这种工程师吧！”

熊元启说，熊元启热情洋溢地说：“我看生产建设需要工程师，改革也需要另一种工程师。政治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让我们都做这种工程师吧！”

熊元启说，熊元启热情洋溢地说：“我看生产建设需要工程师，改革也需要另一种工程师。政治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让我们都做这种工程师吧！”

熊元启说，熊元启热情洋溢地说：“我看生产建设需要工程师，改革也需要另一种工程师。政治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让我们都做这种工程师吧！”

熊元启说，熊元启热情洋溢地说：“我看生产建设需要工程师，改革也需要另一种工程师。政治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让我们都做这种工程师吧！”

(下转第四版)

(上接第一版)

火焰，点燃自己，照亮别人

1985年4月的一天傍晚，湘西北的崇山峻岭中，一辆运毛竹的汽车，从山腰翻进深谷。司机跌断路筋，搭车去的农民，三人摔死，九人重伤。一辆“东风”卡车上路，司机毫不迟疑地伸出了救援之手，忙碌了一夜。遇难的人得救了，这位司机却没有留下姓名。

根据车号，从4月寻访到9月，找到了仪表厂汽车队，给这位名叫陈元启的司机送来一面锦旗和五十元酬金。这位四十七岁的老工人，把这笔酬金悄悄地送到了已经逝世一个多月的熊元启的家中。熊元启的妻子成己珍把钱退给他，陈元义又把钱送过去，这样互相推让了三次，陈元义只好把这笔钱“化整为零”，一次又一次地买东西，把钱花到了熊元启的孩子身上。陈元义说：“我送的是一片心啊！是熊科长给我树立了做人的榜样。”

汽车队的队长谈起这类感人的故事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边说边抹眼泪道：“熊科长活在我們工人心里，他生前对汽车队的帮助实在太大了！”

汽车队是熊元启的“联系点”。1984年底，汽车队实行经济承包，司机机按空计奖。赚了“千多亏少”一样的“大锅饭”，司机们大为不满，队里收入多了，但是，也有人以为“承包就是多捞”，干活挑肥拣瘦，把外出揽活挣得的收入当“外快”装进了腰包。熊元启及时提醒队干部：“改革要坚持，但不能以为为钱能解决一切问题，政策越宽，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又要开括活，又要严格纪律，具体应当怎样搞？熊元启和队干部一起调查新情况，研究改革中加强思想工作的“新招数”，并建立起每星期一检查纪律的制度。他又到司机中宣讲改革的自的、意义，讲如何处理国家制度和个人的关系。有一个青年司机，私留了钥匙。熊元启专门抽空跟这位司机出车。熊元启身体瘦弱，一米七一的个子，体重不满百斤。跟车中，他经常将驾驶装脱下来，累得汗水浸透了衣衫。行车间隙，他给孩子们讲了故事，他得到周总理的教诲，讲到节省省生活开支支援灾区，讲得这个青年激动地说：“熊科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不久，这个司机在外揽活，别人塞给他四百八十元“红包”，熊元启分文不拿地到了队里。

这一年，汽车队坚持在承包中加强思想工作，保证了工厂多盈利十五万元，而且全队四十八名司机，个个“单车万无一失，一路清风”，主动上交给的外出“捎带费”就达一万四千多元，成了全油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模范单位。

在新形势下，熊元启就是这样勤于思考，积极探索，努力把思想工作做到实际工作中去。做到职工的心坎上，保证生产和改革的顺利进行。他把这视为“思想工作工作改进的方向”。他说，只有变思想工作工作同实际工作“两张皮”为“哥俩好”，思想工作工作才能“由虚变实、由粗变细、由死变活、由弱变强”。

形变实了，熊元启坚持对职工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不变，但同时又善于把变化的形势进行这样的“基本建设”。人们介绍，他擅长于“集中讲大道理，用理论帮助职工‘明理’，‘治本’，让广大群众摸真理，自己打成一个个的‘销’。他在仪表厂宣传科建立了“联系点”计划，规定每个同志一至二个单位下基层做一专题调查，解剖‘麻雀’，掌握‘脉搏’，写出职工思想动向分析报告，然后有的放矢地开展理论教育。他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提出了十多个针对性很强的专题教育方案，在职工中开展了改革形势、党的党风、物价改革、法制教育、否定“文化大革命”、开发新产品等等专题教育。他讲课，有理有据，深入浅出，工人听得入耳。职工们还记性，有一次讲到如何看形势，他不仅讲道理、列数据，还举出了七种群众生活变化的实例。他诙谐地说：“过去呀，我们搞个在家里，走七里路在露天看电影，还说什么看电影。现在坐在小板的凳上，一边喝茶嗑瓜子，一边看电视，还有人还发点牢骚……”说得大家会心地笑起来，在笑声中提高了认识。

有人说，现在的马列主义，重实效、轻信仰，具有“抗药性”，很难向他们灌输马列主义。熊元启也曾为此犯愁。针对三十人参加的青工理论培训班，只有七个人报名。但熊元启没有因此却步，而是把培训班越办越活跃。他采用“兴趣启迪法”，组织学员到荆州地区博物馆、社会福利院、工农业展览馆等处参观；他采用“挂图教学法”，和宣传科副科长张树林一

领导重视 湖南各地加强基层政权建设 采取有效措施

本报讯 湖南省基层政权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在4月14日结束的省、市、县、镇四级会议上介绍了典型经验，提出今年为全省基层政权建设年。湖南省农村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镇人民政府的工作，是从1982年开始的，为1984年9月全部完成。为了加强基层政权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一年多来，湖南省各级党政领导不断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工作。去年12月，省委常委强调在1986年内要把基层政权建设继续当作一件大事来抓：今年1月，省民政厅负责同志带领工作组到怀化地区和一些县、市调查，总结典型经验，2月下旬向省委、人大常委会汇报；4月召开省、市、县三级常委会，推广典型经验，提出继续抓好这项工作的要求。由于各级领导重视，因此基层政权建设工作呈现可喜的局面。

原装甲兵顾问黄鹄显同志在京逝世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原装甲兵顾问黄鹄显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4月1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二岁。向黄鹄显同志遗体告别仪式5月3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黄火青、程子华、张爱萍、洪学智、康克清、杨成武和黄克诚等同志，以及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福建省、湖南省、天津市等单位送了花圈。

余秋里、康克清、杨成武等六百多人向黄鹄显同志遗体告别。

黄鹄显是福建省上杭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历任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红四方面军作战科长、

自信 自强 自尊

起，动手搜集、绘制了几十幅图表，使抽象的原理形象化。上哲学课，他用一颗葵花子由种子到发芽、开花、结果的一系列变化图，讲解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上政治经济学课，他用工业生产、销售产品的过程图，讲解剩余价值的原理。培训班还举办智力竞赛、演讲会，寓教于乐，以乐促教。这样适应了青年“求知、求知、求知”的特点和理论课程、不愿进课堂的来了，求大的要求短训班的时间。老工人们普遍反映，经过学习的小青年，“说话办事都好像多了一把尺子”。青工培训班一办办了十六期，一期比一期办得好。全厂三十五岁以下的六百多名职工，绝大部分得到培训，职工中大多数人要求入党。仪表厂因此一跃成为全油田青工培训的先进单位。

出色的政治工作赢得了职工的爱戴。1984年，全厂各个支部一致推选机关工支部为模范支部，宣传科还夺得了机关科室中唯一的流动红旗。这年年底，油田宣传部到仪表厂调查，以“这里政治工作的威信越来越高”为题，总结他们的经验在全油田推广。经验是什么？熊元启说，关键还是要职工干部自己以顽强的意志和开拓精神做好工作，政治工作只有改进才能加强，要作为才有地位。

熊元启开拓精神的源泉是什么？宣传科的同志们认为，来源于他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刻苦钻研。请看一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熊元启的信仰学习日记：学习党的十二个文件得笔记五万字，学习党史笔记一万字，学习哲学笔记一万字。他还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心理学、法学、新闻学、国民经济学、现代汉语等。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他，但去年夏季第一次自学大学课程结业。仪表厂自修班总分考了全厂第一，个人的考试成绩在全局名列第二。

他学字人口多，生活简朴，但他买书却舍得花钱。有次外出，妻子叮嘱他买好衣服。等他回来，孩子们打开提包，都惊讶地叫起来：“尽是书”。

熊元启的两个孩子，取名都带上了火字边。一个叫“焰焰”，一个叫“炜炜”。熊元启说：“我就要那个火字，火炬，发光发热，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他自己正是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用马列主义的光源，点燃了自己，照亮了他人。

开发人们心灵深处的精神能源

在群众的心目中，熊元启是一个可亲、可敬、可信的良师益友。

仪表厂青工小侯热衷于“结交好友，扬名江湖”，往住一个干不了个半月的活。提起他，有人直摇头，说他“制度卡不住，奖金控不住”。

但熊元启满怀信心去做小侯的工作，他看到了小侯的闪光点。

在一次车间会上，小侯听别人说他后劲，顿时火冒三丈，拂袖而去。在自尊心的后面，难道不是自尊心吗？

小侯爱学习爱读书。知识，难道不是自尊心的益友？熊元启从该读书入手和小侯接近：“你爱读什么书？”这个有点傲气的小伙子心里好受；我要求难这个“万金油”！他歪躺在地上，“我爱读《诗经》。”《诗经》啊共有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你喜欢什么？”小侯吃了一惊，从床上跳下来，两人越谈越投机了。

熊元启一次谈次上大门，和一位从读书谈到求，从历史名人谈到人生的意义。他说：“青年要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没有理想就没有风帆的船。”小侯富有人的胆量，但又缺乏勇气。熊元启开导他：“一个人有两条生命，一条是生物意义上的生命，另一条是政治生命，只有具备这两条生命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生。”

这样，小侯逐渐有了变化。他参加青工理论培训班，被评为优秀学员，熊元启给他去了奖票。回到车间，小侯月目标超额完成任务，还考进电大，入了团，带上了徒弟，成了生产骨干。熊元启及时又选他参加了全厂青年理论培训班优秀学员讲会。当小侯登上讲台，讲到自己的变化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小侯在掌声中受到震撼，他感受到了真正的信任、希望和深厚的爱。他牢记着：是熊元启点亮了他的心灵之灯，帮助他编

织了理想的花环。熊元启逝世不久，小侯含着眼泪，写出了他的人生申请书。

熊元启曾经收藏的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他在其中的一段话下面划了粗粗的一道红杠：“短处人人皆有。我们政治工作者的天职，不是短处人人短处，把人治住，而是在激发每个人的长处之中，把本人变成贤人。”他非常欣赏这段话，因此也是他的指导思想。他说：“石油工人要干千百计地地开发物质能源。我们是工人的工作，就要象钻井工人那样，千方百计地地开发出人们心灵深处的精神能源。”

钢管厂有个青年党员，认为找个“理想情侣”是人生的最大幸福。他找对象有三条标准：一是有家庭有叫，“权力支派”是“瞎”问题。“瞎”问题，“瞎”问题，叫“精神支柱”。结果挑三拣四，错了错误，受到党纪处分，从此一蹶不振。熊元启在车间蹲点，主动地接近，帮助这位自认为被人嫌弃的同志，以火热的赤诚，温暖了这颗冷却了的心。这个青年振作起生活的勇气，把过去的“三条标准”改成了争当合格党员的“三条规范”，每月争取做三件好事，重新获得了群众的好评。

熊元启这样时刻不忘开发精神能源，而且往往匠心独运，有所创新。仪表厂地处偏僻，有些青年因业余生活单调，跑到附近农村偷鸡摸鱼，寻求刺激。团委想举办舞会，但有人担心会“跳”出问题。“嘴上说得好，行动上不行”。只有千方百计美化、活跃职工生活，才能有效地抵制不健康的东西”。他为准舞会办会前忙后，同时建起了会中定标准，搞评比，办成了一个优美、舞会表演、健美舞的“三美舞会”。连发的奖品也是美的：整洁的领带，别致的胸花、美丽的花卉。舞会开得青年心花怒放，也使一些爱美不识美的青年在娱乐中陶冶了情操。

在塑造别人又塑造自己的岗位上

仪表厂工人袁新与熊元启同住一幢楼。经过十内内乱，他曾给自己“约法三章”，其中之一是不与政工干部为伍，因此对熊元启敬而远之。但通过观察，他发现熊元启平易近人，克己奉公，不是那种“嘴上说得好，行动上不行”的人。袁新向熊元启家学家访，逐渐发现，在这位当了多年仓库管理员、指导员的袁家，像一条家的家具大柜，是别人转让的，长期没有上漆；翻倒倒柜竟然找出一根木条、一颗钉子。他不由打心里佩服熊元启。熊元启去不欠，国庆节连星期日休假三天，袁新就请到熊元启家当了三天义务油漆工，他默默地做那个大衣柜漆了一遍又一遍……

熊元启把政工工作称为“既塑造别人又塑造自己的岗位”。他说：“政工干部担着重培养青年教育人的重任，如果自己不出作表率，道理讲得再好也没有人听。”他是真理的宣传者，也是身体的力实践者。他生活在群众中，群众听其言，观其行，把他视为楷模。他的老父亲来厂从从包装班上拆下来的破木板想拿来当柴烧，他请求父亲把木板送回到原来的地方。他在老家石首县建上本单位的过路车，顺便带回了几件箱箱，随后他就找会计，主动交了元钱的汽油费。他说：“公家的东西谁也不能沾。”他要求妻子成己珍“上班走在别人前面，下班走在别人后面。”有一次，成己珍在上班时买菜回家，马上受到了责备。成己珍抱着委屈，本来就委屈，同他吵起来说：“你当你的干部，我当我的工人，我不沾你的光，你也别管我！”熊元启耐心地说服她：“干部家属要注意影响，不然叫我么去做别人的工作？”

熊元启这种公私分明、严于律己、从不索取、乐于奉献的品德，在他面前神圣感、生命危危之际，更是象聚光点一样集中地闪现出来。

1985年5月中旬，熊元启发现腹部隆起一个肿块，经医院检查，是个恶性肿瘤，急需确诊。当时，厂党委安排他去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培训，原定22日熊元启讲这一课。科里的同志都提出要他讲了，他看到连去武汉看病，但他还是硬撑着登上了讲台。听课的人见他，他额头冒汗，脸色发白，不到半小时便坐不住了，常常用手揉抚肝区，用桌子紧紧地顶住腹部。这一课，他竟坚持讲了整整两个小时。

5月31日，熊元启的病在武汉确诊为晚期肝癌。谁知写着“癌转移”的诊断书落到了他本人手里。陪护的同志得知不知

北京供电局纠正行业的不正之风

据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记者潘善章）北京供电局在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的过程中，对有些职工以权代电、卡用户乱收费的情况认真查处处理。截至4月底，全局已清理出不合理的收费二万四千五百元。其中有十七万多元已按退回到用户手中。去年底开始纠正这种行业的不正之风后，局的领导干部从自己做起，带头自查自纠，九名局领导干部首先清退了1984年和1985年基层单位违反规定发给他们的奖金八千五百六十元。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局职工也逐项清查了以权谋私的问题。对个别违法违纪的职工，这个局还进行了严肃的处理。

王锡爵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回到祖国大陆是自己多年的愿望 海峡两岸同胞都希望早日统一

本报讯 据广州日报5月4日报道：3日下午，驾机飞回祖国大陆的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波音747飞机机长王锡爵在飞机场，接受广州日报和广东电视台记者采访时激动地说：“回到祖国大陆是我多年的愿望，台湾海峡两岸的同胞都希望祖国统一起来，而且相信迟早都会统一。我这次回祖国大陆，完全是我自己的意志，与任何人没有关系，连我的家属都不知道。我的太太和孩子都在台湾，希望当局当局不要迫害他们。”他还说：“我现在在五六十六，还可以飞几年，中国民航如果需要我，我愿意效劳。”

王锡爵是3日上午从新加坡到曼谷载货后飞来广州的。王锡爵是四川省遂宁市人，在家乡有父亲和兄弟。

解峰被补选为河北省省长

新华社石家庄5月4日电 河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补选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解峰为河北省人民政府省长，补选河北省计划经济委员会主任朱家为副省长。

田纪云会见加蓬政府贸易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国务委员田纪云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商业和消费部部长恩图恩图、埃乌内率领的加蓬政府贸易代表团。

埃乌内是邦戈总统的私人顾问，曾随邦戈总统三次访华。会见时，他告诉田纪云此次率团来访带来了邦戈总统致邓小平主席和赵紫阳总理的信。

今天下午，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郑拓彬同埃乌内内约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双方就进一步发展加中两国经济贸易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楚图南会见阿根廷客人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拉友协会长楚图南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了阿根廷恩特里奥斯省省长、激进全国委员会书记塞萨尔·蒙特和夫人一行。阿根廷驻华大使埃克托尔·阿·苏维萨萨参加了会见。

所惜，熊元启却坚定地对他们说：“我是共产党员，我知道该怎样对待”。晚上，他依然靠在床上，聚精会神地看他带来的那本《国民经济管理学》。陪护的同志把书看完一遍，遍他喊他，他把书要回来，一直看到翌日凌晨。6月1日，熊元启乘救护车回厂，又一路手不释卷。在翌日凌晨过了近六十小时，回到家里没等妻下火，他微一笑：“医生说，可能是个性性偏，问题不大。”吃完晚饭，熊元启又翻出一叠叠稿，伏在桌子上改写起来。他改写的是一份在厂内开展“谈形势、议改革、顾大局、守纪律”的教育提纲。第二天一早，熊元启拿着这份提纲走进党委书记办公室，厂党委书记陶天景和厂工研研究所的医疗顾问、熊元启主治医生：“我四十二岁，一半时半时出来问病，我希望搞这次教育再去治疗。”陶天景的眼眶红了；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熊元启啊，你身患绝症，还一心扑在工作上，全然不顾自己！

熊元启第二次到武汉治病，住在他工作过的油田汉阳仓库，仓库领导给他派了几次车，他十分不安，要妻子陪他去乘公共汽车。看一次车，要换两次车，步行两里路，来回五个小时。时值盛夏，暑看归来，他浑身汗透，瘫软在床上。成己珍说：“现在不找领导不行了！”他坚决地说：“我不能工作了，不能再给组织上添麻烦”。

在生命的最后半个月，他住在油田职工医院，自己需要照顾，却要妻子去关照邻床的病人。剧烈的疼痛折磨着他。成己珍感觉到他痛苦难忍的身躯，含着泪劝他：“你疼就喊吧，喊出来会好些。”他怕影响别人休息，即使牙齿咬肿了，嘴唇咬裂了，枕巾被汗水浸透了，也不喊出声来。这是何等坚强的毅力！

熊元启中年逝世，膝下尚无有承大业的子，最大的十五，最小的十岁，昏迷中，他呼喊着“孩子！孩子！”在武汉治疗期间，他得知不久将与亲人永别，望着妻子陈淑、忧伤的眼睛，他心陈阵痛说：“己珍，我这病难好着了一起生活了十五年，你对我心太少了……”他便嚷着，坚持要妻子去买一双称心的项链。他惦记侄儿，靠着妻子的搀扶，走几步，歇一歇，还没有走到商场，就瘫在地下起不来了。成己珍再也没忍受到下，自己跪地痛哭，随便买了一只双链就匆匆买来。熊元启听到了她满含痛苦的脸上泛起了笑容，而成己珍的泪珠止不住落了下来。

“无泪未必真豪爽”。在熊元启的心底，埋藏着对妻子和孩子们最真挚的爱。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弥留之际，他觉得自己工作得太少，给予亲人的也太少了。

但是，当陶天景征询他今后对组织有什么要求时，他说：“党给我的够多了！”他没有提出任何一条要求来。有几位同志私下对他说：“你是政工干部、共产党员，有些事必须组织直接提，那就对我们说吧。”熊元启坦然地笑说：“我要有要求，早就对组织讲了，何必绕这个弯子呢？”他看到成己珍也在场，接着说：“你们，包括己珍，都不要绕组织伸手，这就是我的要求。”

熊元启1944年出生于湖北省石首县绣林镇，二十二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平凡而又光辉的一生，塑造了一个自信、自尊、自强的政工干部形象，塑造了一个无限接近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形象。他的事迹迅速传遍江汉油田、石油战线。江汉油田的每个角落，都掀起了学习熊元启的热潮。石油部授予他“模范思想工作工作者”的光荣称号。中共湖北省委和石油部党组作出了号召向熊元启学习的决定。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专程到江汉油田调查熊元启的事迹后，称赞他是在开放搞活经济的新形势下，勇于和善于探索新思想、工作新思路的一名先进，是用马列主义原则规范自己又规范了别人的工人。在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写下了“熊元启同志是思想政治工作队队伍的忠贞榜样”的题词，号召全国政工干部向他学习。来自全国各地的几位政工干部，无不为他的事迹所感动。参加会议的几位老一辈革命家听到他的事迹止不住热泪盈眶。

熊元启曾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文件的体会中要求说：“共产主义一直在实践着，道路就是自己的脚印”。熊元启一直走在实践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这条光辉的道路，正在全国千万政工干部、共产党员的脚下延伸……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 联合调研组 湖北日报记者 黄发森 梁均泰 新华社记者 李永长 周东发 本报记者 龚达发

断探索这一教育的特点和规律，使它科学化、系统化、制度化。他们针对青年学员求知、求实、求乐、求美的特点，实行多种教育的统一，发挥德育、法律、教育的整体效益；建立学校、部队、社会、家庭相互贯通的网络结构，发挥各种制约条件的积极作用。

海军南海舰队某工程技术大队开展“讲理想、比贡献”活动

本报讯 海军南海舰队某工程技术大队，在支援深圳特区建设中，干部战士讲理想、比贡献、两年多圆满完成二十二项工程。最近深圳领导赞扬他们是一支有理想、有干劲建设特区的“铁军”。

工程技术大队战士的干部战士在深圳住的是四面透风的草棚，吃的是粗茶淡饭，承担着繁重的施工任务，各方面待遇与特区群众比相差一大截。开始时，个别战士感到“吃亏”，有些不安心，个别战士甚至到了“讲理想比贡献”活动，对青年战士进行“四有”教育，激发了他们做“四有”革命军人、建设特区的热情。在承建黄贝岭二期工程中，干部战士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连续干四十天，提前完成任务。来自全国最富裕的广东南海县战士李玉良，组织上曾劝他退伍，亲戚们给他在家找好了工作，后因部队需要保留技术骨干，又把他留下来。有人给他算了一下，在部队明年一年经济上要亏几千元，李玉良说：“部队需要我，特区建设需要我，我很自豪。要是为了钱，当初我根本不会来当兵。”

（毕振刚 杨礼彰）

武警北京总队表彰一批团干部和先进团组织

本报讯 “五四”青年节前夕，武警北京总队政治部通报表彰了一批在基层团的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团干部和先进团组织。

为提高团干部的业务素质和管理能力，总队组织了十七个团工委采取集中办班、函授作等多种形式的培训团干部，仅第一季度就培训团干部二百零六名。居住在闹市区的六支队，建立了法制、交通安全宣传组，用挂图、录音、黑板报向群众宣传法律常识，还设置义务理发修脚、茶水供应站和医疗服务台等，为群众服务。

（耿大建 袁铁玉）

空军雷达学院对学生进行为国献身教育

据新华社武汉5月3日电（记者朱浩、通讯员王群明）空军雷达学院坚持对学员进行为国献身教育。几年来从该院学院毕业的一万多名学员全部愉快地服从分配，其中半数以上主动申请去边远、艰苦地区工作，有一千五百余人立功受奖，十一人在为边陲儿女们挂奖章立功中获得嘉奖。解放军政治部最近向全军转发了他们的经验。

这个学院坚持把培养学员为国献身的精神摆在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位置，不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

吴 江

根据本书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列宁

实践中的社会主义

1891年，一个名叫康德·施米特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德国青年作家写信给恩格斯，向恩格斯陈述他的写作计划，说他准备关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文章，征求恩格斯的意见。恩格斯回答说，这项写作计划要认真考虑，“然而，我劝您：放它九年，先不拿出！这是目前存在的所有问题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23页）。恩格斯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实际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十九世纪已经不可能了，它至少须待到1900年即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才可能由实践提供某种解决办法。

恩格斯这个意见，是根据半个世纪经历曲折道路得出的。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这是他们当时所能做到的最高成就了。为了使社会主义变成科学，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条件的基础之上。关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图景、构想，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只能根据历史事实和当时发展过程得出的结论，进行这样那样的粗线条的推论与设想。1886年恩格斯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郑重声明，关于如何对社会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所写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9—420页）

大约在1849—1850年的时候，马克思曾经说过，实现这样的共产主义大概“需要经过若干年”，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将同时胜利。然而，直到十九世纪结束，社会主义在世界上一任何一块地方都没有投下它的足迹，原来认为资本主义革命容易破裂的地方，运动的浪潮反而次第沉寂下去了。

但是恩格斯的期望并没有落空。二十世纪果然成为人类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世纪（不可忘记，二十世纪同时也是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世纪，这两件事加在一起，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二十世纪初期出现在人类历史上的社会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旗帜，这是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的历史已经证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阐述以及由此得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趋势的结论，是正确的，与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的东西是相符的。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大都是在经济比较落后或只有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起步，因此出现了一批经济上暂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年说过，“如果我们社会主义的道路，那末将来终究会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不能阐述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将来是什么样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我们不知道，也不能说。”（《列宁全集》第27卷第134页）

应当说，列宁当时关于社会主义特征和构想的并没有超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描绘的图景。列宁最初设想从当时俄国的经济水平出发直接过渡到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大概也不会超过几十年时间。后来实践很快证明这种设想不切实际。列宁说，“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页和687页）。

但是，这里所说的对社会主义整个看法的改变，还只是涉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集中表现在提出新经济政策，而并不说明列宁对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社会图景作了根本性的修改。虽然马克思指出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必备标志，并且列宁已经有了关于从实际出发根据经验来划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但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样子，究竟怎样才算是一个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由于当时的条件，列宁最后也没有可能留下什么明确的指示。

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苏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其标志是：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实行按劳分配。

把以上这些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标志，在理论上、原则上是不能反驳的，因为既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并居于统治的地位，那么这样的社会就理应叫做社会主义社会，正好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理应叫做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而不管它的经济发展程度如何。

中国在1956年宣布已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因而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是按照上述的标准。

这里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提出改变包括所有制和分配在内的生产关系的要求，而没有提出生产方面方面的要求。仅仅达到改变所有制的要求，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只需要若干时间就行了。但是，获得社会主义社会的名称是否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完全建成或完全胜利呢？根据经验恐怕已经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于现实的历史条件，这里要作出适当的区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以确立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为标准；建成完备的经济上发达的

社会主义社会，则还必须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使生产力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早在1956年即刚进入社会主义那一年就已提出。1957年1月，在一次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座谈会上，毛泽东说：“说我们已进入了社会主义，进入了是进入了，但尚未完成，不要说已经完成。”同年，又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374页）又说：“究竟要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同上第482页）稍早一点，毛泽东还说过：“要建成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同上第139页）。

应当说，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的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他的见解是从现实出发的。他实际上已指出，我们只是进入了不完全、不巩固的社会主义，或者叫做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这毫无疑问是对的。只是此后，由于对新生产关系的作用的神化，他对发展生产力的速度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由于社会主义产生的现实条件，很自然地需要一个由资本主义（在我国是新民主主义）到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建成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对我们来说还是一片尚未完成的文章。但根据经验已经可以确定，在我们的条件下，这个时期大致包括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时期的任务是要对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和个体小生产成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便把全部国民经济转到社会主义轨道上。经验证明，要实现经济领域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很不容易的，必须自始至终按照本国民族的特点进行探索，为此就需要有足够的时间，不能匆匆忙忙地进入社会主义、获得社会主义社会的称号为满足。

第二阶段，进入社会主义以后，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主要通过这一途径把初级形式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发展成为完备的、巩固的、经济上发达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发展上述条件外，还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高于一般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公有制水平 and 较高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准，政治上实现高度民主化，社会成员有较多的自由时间（也就是较多地缩短工作日）以获得全面的教育和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等等作为必备的标准。要达到这样的社会主义，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就不能不经过一个长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为了紧紧抓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最主要最根本的环节，已居于统治地位和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要有勇气和魄力运用一切足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特别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实现经济现代化。

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长期性

迄今为止，人们有时在过渡问题上之所以犯错误，大都在于看不到或者不承认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最后一个特殊的阶段，企图超越这一阶段。确实，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未曾有专门使用“社会主义建设”一词，没有提出要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列宁开始用“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这一新词，但列宁在当时也并不认识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后来的实践虽然迫使人们承认这一阶段，但同样不承认这个阶段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却错误地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看做是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开始。

苏联在1936年宣布实现社会主义，1938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就提出要在五年内“完成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并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1952年又宣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已经完成”，已处于“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期；1961年宣布苏联已进入“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早些时候，一度宣传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近又改变提法，认为苏联尚需发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如此等等。

从五十年代开始，社会主义世界骤然兴起了一阵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浪潮，开始了各种形式的运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口号，用各种方式鼓动人们的“共产主义”热情。

中国从事此项试验是从1958年开始。第一个号令就是“鼓”资产阶级权利（权利），“立”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精神。换句话说，就是“鼓”按劳分配的原则，“立”平均主义的权威；并从理论上批判社会主义的“巩固性”，认为社会主义不应该谈“巩固”，“巩固社会主义”就是停止向共产主义前进。与此同时，改变“过渡时期”的提法，将原来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分解性的提法，改变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个一般性提法。这一改变虽然没有有什么新的理论意义，因为在理论上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原来就包括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阶段在内，但在上述情况下，这一改变无疑是表示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并不存在或者转瞬即逝，社会主义制度将很快为共产主义制度所代替。

结果如何呢？结果象大家所看到的，这种“左”的运动实际上反而同社会主义建设起了严重阻碍作用，延缓了历史的前进。

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好不容易才重新回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今后几十年时间，我们将一心一意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心一意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因为在我们重新回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时候，又立即发现，我们在过渡时期第一阶段所创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照搬别人的模式，脱离我国国情，因此，有相当一部分至少在形式上不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甚

至不同程度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生产力的障碍。因此，在当前，为了推进建设，我们首先面临着一个改革的任务，就是说，目前要把改革放在首位，不改革无从推进建设。

所谓改革，不是别的，就是指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逐步消除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自身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不管它们在历史上是怎样形成的，超过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所要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别的，而是指最能够在有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

要在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历史阶段上稳稳地站住脚跟是很不容易的，正如三十年代在民主革命阶段上站稳脚跟就能够抗拒“左”倾冒险主义的冲击曾经很不容易一样。多年狂热宣传的东西不会很快全部从人们的头脑中消失，“左”倾共产主义的历史教训必须吸取。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向人们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这是毫无疑问的。共产党人不可以宣传和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还算什么共产党人？事实说明，一个人如果没有远大的理想，也不会真正从事革命的志趣与持之的热情。这里所谓理想，当然不限于抽象地谈共产主义的远景，必须包括达到这种远景的现实途径，包括改革的理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想，爱国主义的理想，实现社会主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理想，建成完备的经济上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等等。总之，这种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一定要同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密切结合，不能与之脱节。

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从理论上适当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历史阶段的联系与区别，是我们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在实践上解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关系，如前所述，却是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脱离实际而单讲书本，难免要得出这样那样的不适当的结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马克思曾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严格加以区别，因而也未曾把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加以区别。七十年代中期，马克思首先提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或第一阶段的建设。这无疑是马克思根据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条件所作出的科学论断。怎样对待这个论断？我以为，马克思提出这一论断不是为未来产生的社会主义规定一种固化的模式（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再三声明了的），因此，这个论断在应用时必须使之同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相结合，活生生的现实当中的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其自身的不断发展过程。这一点我们不能忽略了。

如果我们从现实地清醒地思考问题，不难看出，我们现时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其发展过程和发展程度和马克思原来设想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很不相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不仅已经完全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实现了很高水平的一全社会公有制，甚至国家也变成了非政治性国家等等，这种社会主义已达到了可以开始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水平，因此无需有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而我们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则是以落后的封建半封建地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其发展水平（包括公有制的内容和水平）和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差别，不仅有发展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部分质的差别，如果没有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不可能获得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这就是我们对于重要的历史事实和具体发展过程。探讨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根据这种情况，很显然，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社会经济水平不高而不承认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前面已经指出，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决定社会的性质，决定社会性质的是社会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及以此而转移的其他生产关系包括分配关系性的性质。曾有人拿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发展水平和特征作为衡量我们的社会是否已进入社会主义的标准，这是不对的，是一种误解。另一方面，按照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轻易宣布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这如同我们在五十年代宣布说“共产主义已经是遥远的事了”一样，是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这样做只能有害无益，因为这样实际上只会使我们目前已经可以开始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结论。只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自然可以说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门已经向我们敞开，但在实际上的距离还很远。曾经在理论上阐述过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即使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在实际处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时，也采取慎重的态度。这时他除了指出必须重视“开始出现的共产主义的东西”以外，曾不止一次提醒说，“对待‘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社会主义只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才会生长出共产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142、143页）。到了十月革命四周年时，列宁更指出：“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列宁选集》第3卷第571—572页）。由于遇到新的复杂情况，这里实际上已有了别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提法了。可见，那时列宁已在实践中察觉到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上要十分审慎从从现实。现在我们把列宁更清楚地看到这种关系的全部复杂性。我们过去经济体制上形成的某些弊端，例如，尽量缩小商品流通的范围，盛行产品调拨，过急地建立单一的公有制并总想把它迅速提高，国家计划用硬性的指令性计划去指挥全部经济活动等，追根究底地说来，也不能不说是同我们主观上希望能够马上向共产主

义过渡这种认识和愿望有关。我们不了解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就其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来说，就具有还要列宁所说的准备的性质，而且这种准备时期比列宁所设想的时间长得得多，过渡形式也会复杂得多，一切将以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发展方式转移。大家可能记得，我们党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曾说过一句十分中肯的话：“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目前也就要要求我们必须首先消除我们体制上一切妨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

这里我们只要提一下关于现阶段是否必要不宣传而且提倡“不计报酬、没有报酬条件”、“不考虑个人的差别”的共产主义劳动问题。不错，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曾经强调宣传共产主义义务劳动。当时正处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需要大大激发劳动者不计报酬条件的共产主义激情；同时，当时也认为共产主义比较容易实现，所以列宁曾满怀信心地对共青团员们说过：毫无疑问，你们将能够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愉快地生活！那个时候，列宁正是根据对于形势的这种估计来提出共产主义教育的。但尽管如此，列宁在宣传上还是有分寸的。就在1920年《从破坏旧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这篇讲到共产主义劳动问题的文章中，列宁也不忘记加以说明：“更确切地说，不是共产主义的劳动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劳动问题”（《列宁选集》第4卷第175页）。大家知道，没有多久，军事共产主义以及平均主义的消后充分暴露出来了，迫使列宁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在宣传上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劳动者对于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上，必须使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和劳动成果直接挂起钩来。这时列宁着重论述的是：对于每个觉悟的工人来说，应当各尽所能地为社会为自己而劳动，不要斤斤计较个人所获报酬的多少，因为苏维埃国家还很穷；但对于国家来说，则必须严格执行按劳分配政策，因为这是目前条件下唯一能够促使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同时也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个别场合下自觉自愿的义务劳动、义务公债等等，自然是一种高尚的道德精神，应当肯定；但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承认个人差别、按劳计酬、多劳多得，并且实行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奖金制度。列宁还指出，要找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尺度，找到使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尺度的尺度，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都没有解决而目前必须解决的难题。

我们目前正在从事的这场改革同样说，前进中的社会主义，既不可固于从书本上所说的模式，也不可固于现实中某种固化的僵化的模式。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之所以深入人心，有生命力的，之所以必然是持续的而不是短暂的，就因为它是从某种教条和脱离实际的模式出发，而是从当前社会主义的实际生活出发，从我国国情出发，它体现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体现着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能力和必然趋势。力量集中于从事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建设，发展我们的生产力，是否会妨碍社会主义的目标变得渺茫呢？不会的。恰恰相反，这样一来，我们将会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地、更有把握地奔向我们的远期目标——共产主义。

我们觉得再说明，近期，我们的经济发展将经历两个阶段：从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终了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目標是实现“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预期从二十一世纪初到二十一世纪中期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是要使我们的经济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社会主义究竟要多长时间才能达到完备的形式，才能达到完全的胜利，就是说，要多少时间才能宣布我们的社会主义已达到向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那种发展水平？这个问题我们目前仍然不知道。如果不再有大飞跃，到二十一世纪中期是否可能达到？或者还需要把整个二十一世纪的漫长时间，而在建成完备的经济上发达的社会主义之后，是否就能马上向共产主义过渡，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现在更难确定。虽然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历史的必然，但具体过渡仍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国内国际的变数很多，我们目前不可能预测，因此也不必过早地拿来争论。

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二十世纪所开创的社会主义，反映了时代的特点。这种社会主义诞生以来，在实践中经过痛苦的探索，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好多事情被迫从头做过，人类为此付出了代价。但是，不管经历如何，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共产主义必然到来这样一个前景，即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地向我们展示了。

时代的特点同时也反映了时代的局限性。二十世纪人类在探索“过渡”方面所走过的艰苦曲折的经验及其方法，对于人类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已经多少有普遍意义？二十世纪以后人类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进而向共产主义过渡？六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以电子技术为主要的技术革命，国家在经济上日益增长的作用，工人阶级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某种变化等等，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方式、途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已经向我们提出的问题都要由未来的实践给以回答。每个原理都有它出现时的时代。我们不能说就得得社会主义的方法只有一种，社会主义的模式只有一种，这是不可能的。

还是列宁说得对：“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不能动摇。但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讲：“我不主张我们死搬硬套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5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求我们创造性地运用它来解决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敢于在理论上有所发展、有所突破。目前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基于基本原理上所以具有新的意义，我想，其原因主要也正表现在这里。

爱理德-西格诺公司新设驻北京办事处,再为中国工业现代化添砖加瓦。



航空航天 电子设备



汽车部件



合成材料 化学产品



中国

10多年来，我们通过爱理德、爱克雷斯、本道克斯、加蒙特、凯洛格和UOP等分公司，向中国提供了丰富的工业经验。

而今，我们爱理德-西格诺总公司驻北京办事处即将于1986年5月6日正式成立。本公司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长期而富有成效的合作。

爱理德-西格诺公司在航空航天、电子工业、汽车部件、合成材料、化学工业等领域名列前茅，为美国最大的四家制造公司之一，年销售额达110亿美元。本公司技术先进、产品优质、财力雄厚、创意求精，因此享誉全球。

我们非常愿意同有关部门洽谈贸易往来，探索业务机会。请与本公司副总裁李安亚先生接洽。电话号码是5006765或5006766。



爱理德-西格诺

玉

碎

〔报告文学〕

袁 鹰

岂有文章倾社稷，
从来倖幸覆乾坤。

——廖沫沙：挽邓拓诗

整整二十年过去了。

1966—1976—1986。

从1966年开始的那场大动乱、大疯狂、大折腾的十年，是一场充满血泪和血腥的噩梦。自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从而永远结束那暗流漫长的夜，至今已近十年。悲恸难忍的悼念，惊心震魄的控诉，骇人听闻的揭发，正义凛然的审判，都已渐次成为过去。大江流日夜，我们的党和人民正在新的万里征途上披荆斩棘，近步奔向前人心神往的二十一世纪。

然而，痛定思痛，怎能忘却那段给我们民族带来如此深重灾难的历史呢？怎能抹淡在那一桩桩、一件件冤案中，数以万计惨遭以毁灭的英灵的名字呢？如果我们不能从血海中吸取历史悲剧的沉痛教训，岂不是枉过了那十年？

在这里，请读者们暂时离开充满春光的世界，回到二十年前那被扭曲、被毒化的岁月，唤回一个忠贞正直的共产党人、一位卓越的知识分子的灵魂。他是那旷古罕见的浩劫中第一个用自己血肉之躯去维护革命者尊严、抗击那恶势力摧残的人。

他就是邓拓，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共中央北局候补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也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政治家、历史学家、新闻学家、诗人、杂文家、书法家。

一

四五月间，本是北京最美好的春日花朝，但是1966年暮春时节，却成了最郁闷恼人的日子。政治气候暮云欲雨，硝烟弥漫，叫人透不过气。

一连好些天，邓拓几乎从早到晚都枯坐在书房里，心情沉重而烦躁。他经历过白色恐怖和反动派监狱里的生死搏斗，经历过战火纷飞和敢后反“扫荡”的艰苦岁月，也经历过解放以来的风雨雨露，却从不曾经历过如此痛苦的心灵上的煎熬。一场政治大风暴骤然而至，雷声隆隆，惊天动地，而且竟竟击到他的头顶上，是他做梦都不曾料到的。

其实，近一两年来，雷声一直在中国大地的上空翻腾。市委会议上讨论过作为主管宣传、文化、教育的书记，他也曾向所属单位的同志们传达和布置过；在熟悉的同志间，更是多次议论过。



· 文学作品专页 ·

对电影《北风中国》、《林家铺子》、戏曲《李慧娘》、《谢瑶环》和其他一些文艺作品的批判，对学术界一些哲学、历史理论问题的批判，调门越来越高，口气越来越硬，帽子越来越大，早已远离学术讨论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稍有政治头脑的人就会意识到，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已经在隐隐发动。

至于要批判吴晗，去年就断断续续听到。开始时，他有点纳闷：《海瑞罢官》有多少可批的？为什么要翻出一个五年前写的戏来批？吴晗又有什么了不得的问题？他了解这位在北京共事多年的同志，深知这位满腔热血、一片丹心的学者为人。写海瑞，赞颂海瑞精神，实在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有位同志曾经大惑不解地问他：“海瑞精神不是毛主席亲自提倡过的吗？毛主席不是批评过那种不顾人民疾苦的死官僚主义者不叫封建时代的‘海瑞’吗？”邓拓当时没有回答，心里觉得这位好心的同志未免象自己过去那样太书生气了。

终于，五十多天前，上海报纸上抛出了一篇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长文。箭离弦、刀出鞘“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邓拓耐着性子仔细读了两遍，觉得此文完全是装腔作势的吓人战术，根本不是谈历史和戏剧，无非借海瑞为由头，扣个大得吓人的政治帽子。那咄咄逼人的架势，深文周纳的论断，更是隐伏着一派杀机。这种文章，怎么能让读者信服、读者受教育呢？吴晗当时就愤愤地对他说过：

“如果真要讨论对海瑞的评价，我可以奉陪，写文章参加争鸣。但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只能保持缄默，以示抗议。试问，我的剧本写在庐山会议之前，当时既不知道彭德怀同志要被罢官，又怎么能未卜先知地影射1962年才发生的单干风和翻案风呢？岂非神话！”

邓拓望着吴晗，只能默默地点点头。吴晗的反批评当然是对的，只是未脱书生气。那个姚文元显然很有来头，有恃无恐，同这样的角色进行什么学术争鸣，岂非与虎谋皮！然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在市委的会议和其他场合，仍然严肃地反复强调：应该坚持党的优良传统，正确处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维护党的思想理论斗争的正确方针。他对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编辑们同志这样说呵：

“《海瑞罢官》首先要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要培养良好的风气，把不好的风气慢慢扭转过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有发言权，不能一批评就不得了。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

邓拓的这段话，表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宣传家的襟怀和风格。江河日下，举世滔滔，他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共产党员的责任，尽力做一点挽回工作。政治风暴一来，知识分子、文化人总是难逃一劫，似乎已经成为一条规律。知识分子的界限总被认为没有改造好，一揪一抓就是一大批，毫不奇怪。可是，他万万不曾料到，此番风暴不同于往年任何一次。就在邓拓和他的同志们顶着逆流、力挽狂澜之际，林彪、江青、康生和他们的党羽，正聚集在电影放映的暗室里磨刀霍霍，瞄准他这颗黄金无价的头颅，要用它去祭他们搅乱天下的黑幡了。

二

阴谋家的行径，从来都是鬼鬼祟祟、见不得太阳的。秦检要对精益求精的岳岳最后下毒手，只敢夜晚在东南下炉火旁同老婆悄悄密议。现代的秦检们，虽然都不忘竭力为自己的鬼域行径描上金碧辉煌的光圈，但在筹划于密室阶段，也不敢轻易宣泄于人。只有到了自以为可以得胜回朝，才会趾高气扬地自我暴露一番。

一年以后，1967年4月12日，江青窜到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场，得意洋洋地夸耀了一番她和张春桥、姚文元之间的一段秘密勾搭。在那个后来广为印发的讲话中，有这样几段妙文：

“批判《海瑞罢官》……张春桥、姚文元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拚命保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提。”江青继续故弄玄虚，装模作样：“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她诡秘地说张春桥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这是电话！六十年代初期，以张春桥、姚文元那班的宣传声名（更不用说江青），真想发表一篇文艺评论，易如反掌，何以要搞得故布疑阵、草木皆兵？很简单，他们写的不是正经文章，而是政治阴谋；他们手里没有真理，只有皮鞭和棒槌。

那天在座的元帅、将军们，目睹江青这一番令人似鬼的表演，有些同志心中数数，但是投鼠忌器，不便驳斥；有些同志平时不注意文化战线的事，对江青的恶感，不免半信半疑；也可能本来就以认定文艺界问题多，现在一听，果然是糟透了，坏透了。这也难免。

这种种内幕，邓拓当时只隐隐约约听到过一点传闻，并未深信。但是康生、江青们几个月来的言行，却使他渐渐地心明如镜。康生其人，平时道貌岸然，俨然一副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的架势。然而邓拓知道这是个翻手云、覆手为雨的两面派，一掌大权便要整人，尤其是整知识分子文人的时候，更是心毒手狠。对江青，邓拓从来是抱敬而远之的态度，他说过这是个蛇蝎一样的女人，心胸狭窄，喜怒无常。前两年她心血来潮，忽然要在北京搞“试验田”，搞京剧改革，作为市委文教书记，他不便硬顶，只好陪上有偏头痛的病，就避了晚上陪江青看戏的苦差。看来，这回很难摆脱这两个人的毒手了。

前些天市委会议上，已经传达了中央精神，要公开批判他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

讨论时，发言的人不多，冷冷清清。大家似乎都有难言之隐，对这次要兴师动众进行大批判，很不理解。以彭真、刘仁同志为首的市委同志们很尊重党中央、毛主席，按照上面的指示布置了要做的事；同时劝他不要紧张，要正确对待，严格要求自己，注意健康，不要把身体搞垮，希望他

邓拓同志画像

蒋兆和 遗作

萧瑛题邓拓《赠杨述同志》诗，原诗全文为：

当年风雨读书声，火水文章意不平。
生欲济人应碌碌，心为革命自明明。
艰辛化作他山石，赴蹈从知烈士情。
岁月有穷恩无尽，四时倾听鸟鸣。

（1963年作）



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将来还要做很多工作。他衷心感谢那些老同志的深切关怀，殷殷嘱咐，言语不多，却体现了革命战友间同舟共济的情谊。但是，回到家里，孤灯静坐，却也平息不了满怀压抑、委屈和愤激的心潮。

据邓拓夫人丁一岚同志和孩子们回忆，那一年几乎整个春天，邓拓都在沉默中度过。家里再听不到娓娓动听的话音，再看不到温和和蔼的笑容。他本来就严于律己，很少同家人随便议论政事，尤其属于党内机密的事，从来绝口不提。孩子们每星期六从学校回家，只见他们的爸爸终日紧锁双眉，连最小的岩岩也不敢多问一句话。大一些的女，在学校里听到党团组织和老师的反教育：“要站稳立场，坚决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划清界线。”他们爱爸爸，相信爸爸，但他们更要同党团组织站在一起，只能用茫然的、带着怀疑和恐惧的眼光偷偷地看看那最熟悉的面容。丁一岚那时正参加电话局的“四清”运动，工作紧张，很少回家。报上的文章，来自各种渠道的传闻，使她终日忧思如焚，却难得有同丈夫倾心交谈的空暇。直到如今，她每一忆及，还是悔恨不已。

三

一进5月，电闪雷鸣，形势更加严峻。5月8日，署名高炬和何明的两篇文章，同时发表，真似五雷轰顶，万箭钻心。翻开报纸，天天都是整版篇幅，通栏标题，从一版到四版，尽是《铲除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坚决同邓拓斗争到底》；打开收音机，从早到晚，都是“愤怒声讨”、“彻底清除”的声浪。那一触即发的火药味，使邓拓终于明白，这场席卷全国的狂飙，根本不是学术讨论，也很难说是“文化革命”，什么“百家争鸣”、“自由辩论”，什么“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什么“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所有这些正常的原则，早就割得无影无踪。而且他已经被剥夺了辩白的权利，那么，还能说什么呢？

凭着多年新闻工作的经验，他自然清楚那种“声势浩大”、“全国一致”的来龙去脉：一纸电文，一个紧急通知，就能够在一夜之间调动起千军万马。社论、材料、文章、反应依次见报，各条战线先进人物、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纷纷出场，反正自有笔杆子捉刀代笔。只要有三五篇、七八篇，就能冠以通栏大标题，“舆论”就造成了。

“群众”是对的。面对那些足以使人神经高度紧张的报纸版面，邓拓痛苦地强制住自己的愤慨：“既然宣布我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敌人，他们当然理应表示憎恨。群众从来是相信党、相信党报的。”

然而，深夜扣心自问，自己怎么会变成敌

人！怎么可能成为敌人？三十多年来，即使在敌人的监狱里，在敌后行军，骑在马上编报纸的日子，他也从未对共产主义事业有半点动摇。即使如1957年那次被无端地斥责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他也只是反求诸己，默默忍受，如鲁迅迅的躲到草中自己包扎刀口的血迹。他仍然一如既往，夜以继日地工作，也仍然用自己的支笔，热情地为社会主义前进的脚步讴歌，为杰出的中华儿女画像。凭什么要诬蔑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前些天，杨述来看他。谈到眼前风云，两位老战友心情都相当沉重。邓拓低低地说：“我作了一年以后再弄问题的准备。”

杨述眯起眼睛，透过深度近视镜向他看了看，摇摇头说：“我看这一次可能会长些，可能需要两三年吧。”

在1966年5月，人们自然不可能对眼前这场正在开始的历史悲剧作出深刻的剖析，即使是邓拓、杨述这样具有高度学识水平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甚至连符合实际的预见也难以做到。他们空自慨叹：“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重泉鸿于海曲，岂乏明时！”只能相对沉默，束手无策。

但是邓拓还有更深的忧虑。很明显，这场政治风暴，已经将党内斗争推到社会上去。姚文元又在杀气腾腾地叫喊：“不管是谁，‘大师’还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什么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还要挖出“最深的根子”。很清楚，诸如“根子”、“包庇”、“后台”这类字眼，岂是某个作者或编辑能够随便加上的？这是明眼人一看便知的。他们的矛头还指向谁？揭倒吴晗，揭倒他邓拓，肯定还要揭倒北京市委，揭思想文化战线的一大批人，那么，他们究竟意欲何为？

〔明日续完〕

热烈祝贺
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开幕

中国·北京

1986年5月

上海幸福洗衣机总厂
广州市自行车工业公司
杭州电脑总厂
山东计算机服务公司
山西运城锅炉厂
金利来（远东）有限公司
广州市亚洲汽水厂
四川拖拉机厂
上海正泰橡胶厂
广东中山市洗衣机厂
重庆钢铁公司
上海培罗蒙西服公司
上海锦华工艺玩具厂
佛山市华英风磨厂
北京日用化学厂
北京祥云实业技术公司
TDK株式会社

广州市万宝电器工业公司
广东顺德美的风扇厂
电子工业部国营第七六〇厂
济南制药厂
四川泸州曲酒厂
上海大中华橡胶厂
青岛第三针织厂
成都牙膏厂“效力多”牙膏
上海广播器材厂
广东梅县市南方手袋厂
广东顺德容声家用电器厂
济南毛巾厂
北京新型建筑材料总厂
上海毛巾二厂
北京华艺景泰兰厂
济南洗衣机厂“小鸭牌”洗衣机
三菱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

北京日用化学三厂
北京利生体育用品服务中心
成都机车车辆工厂一分厂
天津石油化工公司供销公司
成都保险柜厂
广东顺德裕华电风扇厂
北京金属工艺品厂
四川泸州泸州曲酒厂
成都精印包装厂
重庆金刚砂布厂
四川彭山砖瓦机械制造厂
北京音响器材厂
北京大发综合贸易公司
上海织袜五厂
北京兆龙饭店
广州潘高寿药厂
株式会社旭通信社

长江起重机械厂
北京东风电视机厂
四川省塑料工业公司
上海协昌缝纫机厂
四川梓潼千佛曲酒厂
宁波市洗衣机总厂
重庆饮料厂
成都汽车制造厂
成都市华西皮件厂
中国民用航空局
广州市亨联有限公司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丰华圆珠笔厂
北京飞翔有限公司
西南化工联合经营公司
法国航空公司驻京办事处
北京广告公司